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AXUE BODAO ZIXUANJI

唐正东集

资本的附魅及其 哲学解构

ZIBEN DE FUMEI JIQI ZHAXUE JIEGOU

TANGZHENG DONG

唐正东 著

自
選
集

江苏人民出版社

张一兵 主编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MAKESI ZHUYI ZHAXUE BODAO ZIXUANJI

唐正东集

资本的附魅及其 哲学解构

ZIBEN DE FUMEI JIQI ZHAXUE JIEGOU

唐正东 著

 江苏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资本的附魅及其哲学解构:唐正东集/唐正东著

—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4

(马克思主义哲学博导自选集)

ISBN 978-7-214-09284-7

I. ①资... II. ①唐...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69936 号

书 名 资本的附魅及其哲学解构·唐正东集

著 者 唐正东

责任编辑 戴亦梁

责任校对 鲁从阳

装帧设计 许文菲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人民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邮编: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pph.com>

<http://jspph.taobao.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照 排 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

印 刷 江苏凤凰通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960毫米×1304毫米 1/32

印 张 10.5 插页 1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3年5月第1版 2013年9月第2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214-09284-7

定 价 28.00元

(江苏人民出版社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自序

借选编这本论文集的机会,我正好认真地回顾了自己的学术历程,也希望能借此更为清晰地界定下一步学术发展的方向。从1990年硕士毕业留校任教至今,我一直都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进行学术耕耘,迄今已有20多年。这一历程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1990—1997年。在这期间,我主要致力于从客体角度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若干学术问题进行辨识。当时,作为一个刚踏上理论舞台的年轻人,我对国内学界正在讨论的很多学术问题都有强烈的参与意识,尽管现在看来,当时的理论观点的确显得非常稚嫩,但我依然为那段时间自己付出的理论努力而自豪,因为我深刻地感觉到,我的学术思路的基本架构正是在那段时间形成的。在那几年中,学界的讨论聚焦在马克思的晚年笔记、马克思的社会历史理论、马克思的人学思想、实践唯物主义理论、马克思的社会经济形态理论等问题上。应该说,这是国内哲学界通过重新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以哲学的方式来回应当时轰轰烈烈的改革大潮的一种理论努力,这在学术史上是非常有意义的。我当时也就上述问题发表了10多篇学术论文,如《马克思在十九世纪后期俄国社会发展问题上的思想发展》(《南京大学学报》1991年第4期)、《马克思社会历史理论的深层内涵之我见》(《南京大学

学报》1995年第4期)、《用分层阐释法重新理解实践与唯物史观的关系》(《南京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等。当时,我的主导思路是尽量真实地还原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在社会历史、社会经济形态、实践等问题上的原有观点,并努力贯彻我的一个基本观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社会过程论(或历史运作论)层面上毫无疑问是强调历史主体的能动作用的,这是首先要加以凸显的,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应看到,马克思等人还强调了一个历史本质论的理论层面,在这一层面上,他们是强调客观矛盾的涌动所建构出的历史规律的。在解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及其相关理论问题时,忽略了上述两个层面中哪一个都不行。我之所以要从还原马克思等人的原有思想的角度来展开学术研究,其目的就在于说明在马克思等人的思路中,上述两个理论层面的内容都是客观存在的。在当时的学术氛围中,由于我强调了上述第二个理论层面即历史本质论的内容,因而,在有些学者看来,我的这种观点似乎是偏保守的。但我个人至今也不这样认为。虽然我承认这一时期的学术思路中存在着一些逻辑上的薄弱环节,但我不觉得对历史本质规律的强调就意味着学术思路的保守性。

第二个阶段是1998—2006年。这一时期,我主要致力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如何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来诠释其人文精神的。当时学界的很多学者都在阐发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意识及人文内涵,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线索被清晰地展现了出来。应该说,这种理论努力对我国哲学界来说是非常珍贵的。在这种学术氛围中,我也想以自己的方式来阐释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主体性的理解。也许受到我在上一个阶段所形成的学术思路的影响,我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体性是不可能与其强调历史规律的客体性线索相分离的,当然,这需要有前提,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客体性线索有一个准确的理解。我试图说明,马克思是希望通过现实历史的真实进步来实现人类的自由和解放的,而不是仅仅致力于对现实经济变迁的文化效应进行所谓的文化批判。这里有必要对我这一时期在学术思路上的一些转变作个说明。1998年前

后,我逐渐意识到原有学术思路中的两个理论层面如果得不到统一,那就势必会影响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深层内涵的理解,因为如果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历史本质论层面的科学性,如果人类历史的主体性内容只是在历史过程论的层面才具有,那么,当历史唯物主义哲学面对其他各种以本质论的线索来诠释人类自由之实现的哲学理论(包括唯心主义理论)时,就会显得底气不足,因为自己在本质论层面只是在谈论科学性,而不是在谈论自由之实现的可能性。正因为如此,我努力想要证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没有现代性批判理论,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来展开的现代性批判理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没有人文精神,而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方式来展开的人文精神。为此,我就马克思哲学与李嘉图经济学的关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哲学品质、马克思的物质生产概念、马克思的现代性批判理论等问题发表了近40篇学术论文,如《在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忽略了李嘉图意味着什么》(《哲学研究》2001年第5期)、《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现代哲学家》(《哲学研究》2002年第5期)、《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哲学意义》(《哲学研究》2006年第12期)等。说实话,这些论文的确较好地表达了我当时的学术思想。

在我这一时期的学术研究中,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左派学术思潮的研究已经开始,并且就卢卡奇和阿尔都塞哲学思想、法国调节学派的理论等话题发表了多篇学术论文。我当时的一个基本思路是:我能够接受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在解读马克思哲学时所提出的学术问题,但在总体上不能接受他们的学术思路。我总觉得他们的学术思路是与西方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相关联的,譬如他们对文化霸权的批判一定与当代资本主义在20世纪所发生的社会经济转型相关联。如果这一点能够成立,那么,身处中国语境中的我们就必须追问一个问题:一旦社会历史语境发生变化,对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否仍然会理所当然地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重点?再进一步,脱离了对社会经济过程的分析,文化霸权批判的重要性是否会超出其应有的理论边界?也就是说,在其理论

展开过程中,是否会不适当地夸大文化霸权的统摄性?在这一时期,我确实已经开始思考这些问题,这既体现在对卢卡奇、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观点进行分析的一些学术论文中,也体现在我有意开拓对法国调节学派等学术思潮进行研究的理论努力中。法国调节学派是当今国际学界比较典型地从经济矛盾运动的角度来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一个理论流派。我对它的研究,一方面是想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线索进行梳理,以推动国内学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图景有一个准确的把握,另一方面也是为更加全面地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理论提供一个新的学术视角。不过,我必须承认,在这一时期我对上述这些问题的思考还只是初步的,有些问题还没能得出十分清晰的结论,因此,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左派学术思潮的研究中,我只是就事论事地进行一些实证性的研究。

第三个阶段是2007年至今。在这一阶段,我主要致力于在以下两条线索上同时推进学术研究:一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尤其是法国调节学派的研究;二是把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及文化批判理论的综合研究中获得学术灵感,运用到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本质的研究之中。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史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工作,我一直有这样的观点:这两者之间是相互影响、相辅相成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马克思等经典作家的哲学思想研究方面所提出的学术问题,的确可以推动我们以一种较为新颖的研究视角来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中所特有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方法,也能帮助我们更为准确地分析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观点及学术思路。客观地说,在国内学界,比较多的是前一种学术影响,而后一种学术影响则较少。也就是说,我们在引介、分析西方马克思主义尤其是其文化批判理论时,更多的是把其观点和思路同时接受下来,并进一步地影响我们本身对哲学框架的思考。我觉得这种状况是需要改变的。在这段时间内,我有意识地加强了对法国调节学派等西方左派学术思潮的研究,其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抬高这些西方马克思主

义经济哲学流派的学术价值,并进而压低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的学术意义,而是为了展示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完整线索,并在这种完整的理论“路线图”中更为准确地把握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及经济哲学理论各自所具有的优缺点。譬如,如果不了解法国调节学派等学术思潮所阐释的如下事实:随着当代资本主义“新经济”的到来,资本家的关注重点已经从尽量多地生产劳动产品,转向了尽快地获得产品模式或标准的设置权,这一过程是跟当代资本主义转向金融资本主义时代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当你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线索中的思想家们把权力批判置于理论分析的中心,并得出资本已经建构出了一种近乎铁桶式的文化霸权模式的结论时,你也许就会觉得这一结论是无懈可击的。但殊不知,随着金融资本主义体系之内在矛盾的不断发展,这种所谓铁桶式的文化霸权恰恰是会随之而产生裂痕或缺口的,这是当代资本主义文化模式所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而这种从社会经济矛盾运动的角度来理解文化等上层建筑因素的发展线索的方法,恰恰是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所坚持的分析方法。当然,反过来也一样,法国调节学派等理论也因缺乏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理论所具有的深厚的人文精神,而显得经验主义倾向有余但历史反思性不足。

再进一步,当我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上得出了上述认识之后,我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研究上也具有了更为坚定的方法论立场。我相信,历史唯物主义的哲学方法尽管在面对现实社会问题研究时,还需探索出理论转型的中介环节,如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得出的“生产价格”这一中介环节一样,但作为对社会历史过程之深层本质的分析方法,它是非常科学、非常重要的。基于这种学术思路,我在这一时期就法国调节学派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整体反思、马克思的拜物教批判理论、马克思的生产关系概念等话题,发表了30多篇学术论文,如《雇佣劳动的嬗变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及其评价》(《南京大学学报》2007年第2期)、《政治生态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吗?——评阿兰·利比兹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

主义》(《哲学研究》2008年第3期)、《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辩证特性及其当代启示》(《哲学研究》2010年第7期)等。对于近几年来所写的这些文章,我在总体上还是满意的,我希望我的这些学术努力能对国内学界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及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贡献微薄的力量。我的下一步工作设想是:更为深刻地揭示西方马克思主义各种理论背后的社会实践背景,以此来推进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研究。同时,更加具体地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面对现实问题时所需要的“中介环节”,以此来深化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之具体化的研究。

这篇自序就写到这里了。希望下一次再作这种回顾的时候,能有更加精彩的学术观点加以总结。

目 录

上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内涵研究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下遇到的三个理论问题 3

诠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应该坚持的两个原则 16

马克思在何种意义上是一位现代哲学家 23

在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中忽略了李嘉图意味着什么

——以卢卡奇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为例 35

马克思物质生产概念的哲学内涵论析 49

马克思生产关系概念的内涵演变及其哲学意义 62

马克思拜物教批判理论的辩证特性及其当代启示 77

马克思对历史经验论的超越及其当代意义 91

中篇 马克思经典哲学著作研究

正确评价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的思想史地位 107

《穆勒评注》中“交往异化”的准确内容及其思想史地位 121

青年马克思的“现实人道主义”概念为什么很重要? 135

马克思对人类学唯物主义的超越及其理论意义 148

对蒲鲁东的批判给马克思带来了什么?

——《哲学的贫困》的思想史地位辨析 160

基于经济学视角的现代性批判及其哲学意义

——以马克思的“伦敦笔记”为例 172

《资本论》: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发展的第四个阶段 188

马克思的《历史学笔记》与历史唯物论的升华 201

下篇 西方马克思主义及左派学术思潮研究

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方法论反思 215

在科学抽象与具体历史之间:方法论的视角

——从曼德尔、艾伦·伍德等人的方法论缺陷谈起 225

经济学语境中的后马克思主义思潮 240

法国调节学派在方法论上为何走向历史经验论? 246

雇佣劳动的嬗变与当代资本主义的自我调节

——阿格里塔的调节理论及其评价 266

法国调节学派阿格里塔的消费社会批判理论 280

政治生态学代表了马克思主义的未来?

——阿兰·利比兹的政治生态学马克思主义观及其评价 294

劳动—工资关系的弹性与积累模式发展的盲目性

——罗伯特·博耶对资本主义调节机制的解读及其评价 311

后记 326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下遇到的三个理论问题

上 篇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层内涵研究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各个领域的理论探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譬如经典文本的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等研究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新实践情境的开拓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领域的拓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亟待认真梳理与探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讨论,就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一领域内的下一步发展能否拥有一个坚实的思想平台。笔者在此想就如下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马克思主义哲学当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当作其最核心的理论提供科学依据的,因此,他们着重研究的是历史的规律原理。他们从最广泛最普遍入格化的角度,即从阶级的角度来界定历史主体,把阶级置于社会关系中的个人的维度。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个人是由阶级关系所决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当下遇到的三个理论问题

近几年来,国内学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进入到了一个快速发展的阶段,各个领域内的理论探索都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譬如经典文本的文献学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当代解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路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前沿问题等研究领域都涌现出了一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清楚地看到,随着新实践语境的开拓及由此带来的新问题域的提炼,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方面的一些重要理论问题尚未得到认真的梳理与探讨。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讨论,就会影响到我们在这一领域内的下一步发展能否得到一个坚实的思想平台。笔者在此想就如下的问题提一些自己的看法,以求教于学界同仁。

马克思恩格斯当年是把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当作为党的胜利提供科学的依据的,因此,他们着重研究的是历史的发展规律。他们从经济关系的人格化的角度,即从阶级的角度来界定历史主体,相对弱化了日常生活中的个人的维度。在他们的理论视域中,个人是由阶级关系所规定

的,个人的自由也是以阶级关系为核心的社会生产关系发展到后来的结果。在当时的语境中,马克思恩格斯这样做应该说是很自然的。我们知道,马克思当时的主要理论对手是德国唯心主义历史观和英国古典经济学家所代表的经验主义观点。为了批判这两个理论对手,马克思恩格斯当然是强调唯物主义的历史本质论,即从阶级关系这一当时生产关系的核心内容的角度,来深刻地梳理私有制社会历史过程的本质逻辑。这种做法起到了一箭双雕的作用:一方面有力地抨击了上述两种错误的历史观,另一方面又为工人运动提供了哲学历史观上的理论支撑,因为雇佣工人身上所体现的,正是私有制社会的矛盾着的本质内涵。可以说,马克思恩格斯所研究的,不是个人这一客观事实,而是个人在历史观维度上所体现的“意义”。一旦站在这一维度上,就不难理解他们要从阶级的角度来解读个人了,因为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个人之所以会跟交往形式、价值、货币、资本这些概念联系在一起,就是因为他们是以阶级的身份而存在的,或者说,阶级这一范畴体现了这些个人在历史观维度上的“意义”。

当然,在体现历史深层逻辑的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对当下具体的现实问题的解读之间,还是有一段空间的,还是需要由某些中介形式来加以链接的。而这种反映中介环节的理论研究,在马克思那里,客观地说还不是很系统。尽管在50年代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等文献中,马克思的确也谈到过这种中介的问题,但毕竟没能成为他的理论阐述之重点。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带来了一些问题:马克思在理论批判的时候已经完胜了对手,但在现实的工人运动中却常常不得不面对工人在革命主动性方面与自己的理论设想不完全一致的问题。这一线索在当时就碰到了问题,主要集中在作为革命主体的工人阶级为什么在关键时刻不能像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样担负起历史任命(如1848年、1857年等)?后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集中研究的就是这个问题,即阶级意识、意识形态霸权等问题。这条思路继续向下走,便成了对认识主体而不是历史主体的研究,研究的重点落在认识主体是如何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

的,如法国的鲍德里亚、布尔迪厄等。这条解读线索因为忽略了主体身上所负载的生产关系等内容,因而很容易被界定为唯心主义。但正如有的西方学者所说的,生产关系等客观性的社会内容正是由其主观认识已经被建构的现实主体本身的活动而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正是由于主体的观念或认识被建构了,所以,他们才会以自身的活动建构出客观性的社会关系。因此,在解读的逻辑顺序上,首先是认识主体,其次才是历史主体。

对这种观点的分析应该说不是像表面上看起来那么容易。到底是认识主体建构了历史主体及历史现实,还是反过来?我们一般可能会说,当然是后者,尤其是当我们习惯于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角度来谈这一问题时更是如此。但日常生活中的人们所感受到的,往往是前者,因为他们从当下的日常经验出发无法体会到历史发生学维度上的社会存在对当下个人意识的决定性。当个体主体对自己的主观认识进行反思时,所能捕捉到的恰恰是其他的社会意识对他的影响或决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对这一问题的解读难度。

其实,这里反映的正是历史本质论与历史运行论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两者之间是不完全直接对应的。历史哲学家可以从内在逻辑的角度来梳理历史过程的本质内涵,但历史过程中的当下主体有时却无法领悟到这一点,他们往往会站在经验主义的角度来解读当下的事实。日本著名学者广松涉所讲的体制内的当事人与体制外的学者在解读历史过程时的思维差异,讲的就是这一点。那么,既然如此,这一问题是否就无法解决了呢?或者像有的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就应该放弃第一条线索而专注于第二条线索呢?我看不是。在我看来,我们应该做的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内容丰富化,即在原有的对历史规律的探讨的基础上,再加上对日常生活层面的个人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所遭遇的文化效应的解读与批判。当下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该从上述两个层面上全面地展开自己的思想演绎,以期获得足够的话语权,以此来为中国的社会文化建设作出自己的贡献。如果我们只专注于第一条线索而

忽略了第二条线索,那么,虽然我们对历史发展的规律有了深入的把握,但鉴于日常生活中的个人可能遭受的观念拜物教的束缚,因此,他们的行为模式除了基于经济关系或阶级关系的决定性之外,还可能因上述这种观念拜物教而产生行为方式的偏移。譬如,一个雇佣工人在特定的经济关系或阶级结构中,从理论上说应该是起来革命的,但由于受到货币交换制度所建构起来的“平等”观念的影响,最终导致了他对现实剥削制度的忍受。这样一来,历史发展规律的实现路径也会变得更为复杂。这就是我们要关注上述第二条线索的原因。当然,如果我们因此而放弃了第一条线索,那么,所付出的理论代价就会更大。因为在缺失了经济关系之内在逻辑线索的前提下,研究者很容易仅从观念或话语的角度来理解现实主体之行为方式的动因。沿着这一解读线索再往下走,就会把原本体现了历史过程之本质逻辑的历史唯物论,理解为生产力、生产关系等范畴似乎拥有了其自身的内在逻辑,似乎是一种范畴的形而上学逻辑了,而看不到这些范畴所反映的,其实正是社会历史中的个人所必然承载的本质规律性。站在这种解读线索上的学者,自然不会理解日常生活中的个人之所以受到某些话语权力的束缚,不只是因为这些话语本身具有某种力量,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经济生活中存在着产生这些话语的现实土壤。在封建社会中是不可能产生资本拜物教的。也就是说,观念拜物教的背后所隐藏的,是物质拜物教的客观现实。因此,仅通过对话语权力的批判,而不注重对物质拜物教关系的消解,是不可能真正使人获得发展的。

二

历史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讲究社会历史的矛盾运动所起的作用,资本家再厉害、再狡猾地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也会通过经济危机而受到历史规律的惩罚。人类历史将在历史规律的支配下继续向前发展。但现在,像齐泽克所说的那样,随着生态危机、核危机等的出现,人类现